

Translated by Xia Jun and Eva Liu, University of Leeds, UK

有多少能在针尖上跳舞的革命者

一封致齐泽克的公开信 – 布能特·桑枚

就是这个？

以下是基于我为一个齐泽克读者用土耳其语写的前言，但是它又在 IJZS 编辑，保罗·泰勒的建议下被延伸和扩展了许多。书的名字叫《脆弱的接触》（*The Fragile Contact*），是齐泽克自己起的。虽然那时齐泽克已经很有名气了，但是这本书集中介绍了他的（至少其中一些）广泛的，多领域的兴趣。由于在有限的几页书里介绍这么庞大的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求助于齐泽克本人，用他自己叙述的轶事和逸闻来介绍他——一个出版商的伎俩。但是结果是有些歧义的：我担心齐泽克会因为被称作为一个执拗的神经质而不悦；同时又担心他会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来被标榜为思想激进的左翼的榜样而难为情。所以，我从来没有给他翻译过。这将是第一次见到这本书。

我是认真的吗？是的，因为我现在要把扩展过的整个事件向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的读者重叙。对于我们这些试图把两套思想激进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结合的人来说，齐泽克是一个导航灯。虽然他不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个，或唯一的一个，但是它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成就和前途的一个。但是导航灯只是导航灯；它不是太阳，也不是航船。它只能照亮很短的一程。它的光不一定总会在我们需要的时间和地方出现。它有时飘忽不定，有时暗淡，有时又太强烈，特别是当它闪耀在我们的眼睛里的時候。它不是航船，所以不能把我们带到各处去，而只能在我们自己的航行和历险中帮助我们。这就是鉴赏齐泽克：鉴识他的不足，同时也领略他的益处。因此，在我的观念中 IJZS 的使命应该是，不去吹捧他，或重复他（因为他不需要这些），而去指出

他没有走太远，试着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工作是不可能全部被完成的。

‘它’作为一个隐形的榜样

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讲述了关于一个年轻的南斯拉夫人试图躲避军役的故事。这个可怜的人决定装疯。他假装成一个执拗的神经病人，拣起每一片他能拣到的纸，然后一边嘴里说着‘不会是这样的’一边把纸扔掉。后来，军事医学部为他做了检查。因为他在检查期间没有间断他的伪装，医学部最后定论他真的是疯了，给了他退役的文件。这时，这个人停来说‘这就是了！’。这个故事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除了这个伎俩永远不会在我的祖国土耳其得逞的事实）？

据齐泽克说，这一段逸闻代表了一个渴望的目标转变成了实际的目标的例子。就是说，寻求从义务军役里解放和自由的渴望被具体化，变成了一套文件，不仅仅作为能指而且作为寻求解放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对渴望的执拗的表现创造了它自己的目标/对象。就是说，起初当对目标的渴望产生的时候，这个目标还并不存在。

在这样一个为‘主题’着迷的时代（后现代？），齐泽克对‘目标’的坚持似乎有些奇怪；但是自从他的第一本英文书《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他就已经对此着迷。对‘主题’在语法和思想上的坚持意味着自愿行动者的存在，至少是它存在的可能性。也意味着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家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组成因素的存在。马克思在他对政治经济的批判中质难了这个假设：如果我们都是自愿行动者，自由市场中的主题，那么什么是我们语法上的‘目标’？换句话说，是金钱，这个‘商品中的商品’，这个唯一的可以替代所有其他商品的商品。马克思在他的批判中指出，金钱之所以有了这种地位，是因为它是抽象的，没有实际存在的，一个本身没有实用值的交换值（除了作为绝对的交换值）。金钱是‘政治经济的伟大目标’，是一个不可能创造满足，而只能增加对它自身的需求的目标。你可能有足够的食物，衣物，车子或房子，但是你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金钱。金钱确实是拉康的‘渴望的目标’的雏形，是一个永远得不到的，捉摸不透的目标，因为它其实并不存在。对其他商品的需求蒸发成（与‘固化’正好相反）对金钱的渴望。

齐泽克把金钱的概念延伸出了政治经济批判的界限，把它延伸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渴望的目标是一个将会满足我们原始的欠缺所导致的对完整的需求的‘东西’。这种原始的欠缺一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存在，二是来自我们对事物的感知能力。虽然这个东西并不存在，但是对这个东西的渴望是存在的。这个不可能的形势（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的无法满足的渴望）在政治经济的金钱（金钱作为一个不是东西的东西）中找到了出路。如果我们允许自己放纵一下我爱玩的天性，那么金钱和男根的关系（这该是创造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的交叉的主要争论）就会被最好的体现出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短篇‘金钱的魔力’里所有的‘男根’换成‘金钱’，这个短篇的价值和意义一点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见‘男根的魔力’——网页链接见‘关于作者’）。

在政治经济和性中，在我们的吃喝习惯和政治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神经质中，我们不断的寻求着齐泽克所说的南斯拉夫人到底‘找到了什么’。但是那句‘是这样的’却像所有的好的笑话一样，是模棱两可的：军事医学部的人听到后会怎样呢？吃一堑长一智，他们很有可能把文件收回来然后撕得粉碎。可是从另一面来看，一个这么聪明的年轻人难道不知道在他念叨出这些话的时候骗局就会被揭穿？他很可能知道，所以他成功的获取‘渴望的目标’的那一刻就是他泄漏机密的一刻。那个为了这一瞬间而固化的目标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变得遥不可及。

从全球的范围看‘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齐泽克的轶事（完全独立于讲故事人的意向）看做是从80年代早期开始当世界的左右翼分歧的标志被推翻时，对思想激进/或左翼革命政党的执著寻求的一个比喻。虽然‘左翼’从没有同意苏联品质或‘东方集团’，1980年前思想的跷跷板的‘另一端’却不想今天一样的空洞。称它为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衰退的工人的王国或是资本主义王国。范围的另一端是一个‘大他者’，一个左翼可以顺从或反对，可以以它为榜样或从它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父亲之名’。左翼中的定位总是以这个‘大他者’为索引的。不管是好还是坏，每个人都已苏联来定义他们自己。80年代初期后左翼开始失去这个地锚。当然很多批判都指向了这个形势，这个甚至是80年代之前苏联索引的定位，尤其在68运动中和一些托洛斯基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自由马克思主义运动前。但是90年代的到来给了那些对苏联及其苏联

导向的定位的批判一个措手不及。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灰暗无形的空白点，既分化瓦解又不发达，也没有定义和定位。

随着 90 年代的到来，我们的沙发上的图案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钉把‘能指’和‘所指’钉到了一起，而拉康的 *points de caption* 却松动了。沙发失去了它规则的图案和形状，变成了一个杂乱的棉花袋子。我们试着用剩下来的图钉去创造新的图案，结果却是劳而无功；因为每当我们试着去订第二个钉子的时候，第一个钉子就会松动，掉下来。那个构成意义的基石永远的错位了。更不要提那 20 世纪流行的‘绝对的真实’，甚至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和那些转瞬即逝的意义也都变得站不住脚。左翼们不再作解释，只是说‘不会是这样的’。这很快的转变成了一种痴迷：阿尔杜塞？‘不会是这样的！’ 普兰查斯？‘不会是这样的！’ 法兰克福学派？‘不会是这样的！’ 阿多诺？‘不会是这样的！’ 本雅明？‘不会是这样的！’ 回到无政府主义？‘不会是这样的！’ 回到列宁主义？‘不会是这样的！’ 左翼的自由主义？‘不会是这样的！’ 生态主义？‘不会是这样的！’ 女权主义？‘不会是这样的！’ 海德格尔？‘不会是这样的！’ 诠释学？‘不会是这样的！’ 新时代的神秘主义？‘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对这个列表做无限的添加。当然，主要的问题不只是左翼的（假装的）固执的神经质。问题是我们寻找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完全的，综合的渴望的对象。公平的说，寻求过程中的一些预期的对象试图传递过‘我不是它！’的信息。比如说，阿尔杜塞和普兰查斯分别以逃避到荒谬和自杀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我们很接近这个寻找中的不存在的对象。就像罗得的妻子转身回望那毁灭的所多玛城，抓住了一瞬的真实，但是那却是不能承受之重（换成我们任何人也都是一样的）。

左翼真的没有机会说‘这就是了！’吗？如果我们把瓦勒斯坦所有的理性的预测都很认真的对待，那么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中我们将目睹‘我们所知的世界的末日’，这不仅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系统，而且包括我们对这个世界体系的理解。又据瓦勒斯坦，相信这个‘终结’意味着一个预定的新的开始，是愚蠢的乐观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终结’之前和期间的所作所为将是决定这个新的开始的范围和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该是左翼停止假装成执拗的神经质，抓起纸（无论多么过时的，转瞬即逝的，残缺的或是自相矛盾的）宣布‘这就是了！’的时候了。当然，根据齐泽克对

这个轶事的理解，宣布‘这就是了！’的一刻就是找到它的一刻。但不管怎么说对此反面的理解却是行不通的：如果为了说‘这就是了！’而去寻找它是永远都找不到它的。因为寻找的对象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寻找的对象只能在寻找的行为中存在。

“它”就是齐泽克吗？

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起源的传统定义为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即英国政治经济、德国哲学和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三者的结合。归结为人名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亚当·斯密——里卡多，黑格尔——费尔巴哈，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马克思不是他们的信徒，但是他是在一系列的解读了每个三者之一和其他人的学说之后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所以，他学习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出售了唯物主义的内核）；“普鲁东和亚当·斯密”（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推翻了乌托邦的幻想）；“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用辩证的推理重构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发生在齐泽克身上，他也由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开始（实际上是他们中的两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心理分析、对流行文化批判的解读。又要归结于人名的话，这些给予我们“齐泽克的神圣三位一体”的是：黑格尔、拉康、希区柯克。他解读了“黑格尔和拉康”、“拉康和希区柯克”。他也使用了另外一个三位一体，也就是黑格尔、拉康和马克思（以及稍后的列宁）。解读（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再解读）“马克思和黑格尔”，“拉康和马克思”，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拉康”。这是聪明的，同时也是实践的革命的解读“X 和 Y”的策略。（借用了拉康的“康德和萨特”，但实际上是任何一种革命思想的商标）。这些成了齐泽克推翻阻碍他的任何东西的离奇才干的基础，但同时，也应该对造成他兴趣领域的明显混乱承担责任。他政治上的含糊（他是真的赞颂斯大林吗？），文体上的松弛（有时接近泛滥）。他在任何领域、任何学科都停留不了多久，都只是短暂的拜访。他引领他的研究就像进入康尼纳领地（想像中的）进行一系列的劫掠，然后留下一片翻过来的土地，混乱但是成熟，适合再播种。他的研究成了一个原型，八十年代后左派的令人分神的研究的突出模型。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尽管风格过分武断，结论显而易见和想当然，一旦被完成，便成了“这不是它”的宣言。

这就是为什么齐泽克是一个能被同时代的革命的左派冠以“它”之名的罕见的思想家。因为他是他们追寻的完美实例，是目前模棱两可状态和有意的激进主义双方的最为突出的代表。因为他建构了他的（再）研究领域作为一系列的超越。从笛卡尔到巴里巴尔，从黑格尔到谢林，从拉康到斯大林，从古典悲剧到现代流行电影、科幻小说，他是期望的“最终建立”的目标已经具像化的比喻的代表，这个目标一原因的实现正是追寻它自身。毫无疑问，这个“期望的最终建立的目标”是一个零的假设，一个空的位置，一个它的真实的存在正是依赖于本身的虚无的位置。齐泽克看来能填补这个位置（虽然是临时性地）的原因，在于他的过多的涉猎，从不在一个地方长待，能结合这个和那个，解读这个和那个，然后从头倾覆，移入到一个总而言之完全不同的学科上。对齐泽克来说继续填满这个空的空间的一个条件就是继续他的分神的、过分的搜寻。如果在不久的某一刻他喊出“这就是它”，这个“它”将不会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它”。相反，正是通过这个发现的举动，齐泽克自己终止了成为“它”。

“它”被看作假定知道的主体

也许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开始思考齐泽克，试着更远一些的探究这个“它”。什么是这个“它”，哪个是“它”，但是一旦它把之所以成为它的本领归功于自身，“它”不再是“它”。从心理分析上说，假定知道的主体，对分析家来说是明确的。对于它，我们崇拜或轻视，为过往的疑虑和不幸而备受责备，但也把我们全部的希望建筑其上。我们想（我们希望）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别的，我们自己也好过自身。这个假定，根据拉康的观点，是所有分析后面的基本的原动力：如果我们这么做失败了，分析就不起作用。我们不得不猜想我们的分析家看穿了我们的谎言。我们笨拙地试图掩盖，这是我们能继续撒谎的唯一方法。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谎言，为什么还继续给他们一点儿好处？我们的朋友、父母、情人、丈夫（或妻子）做这些完全免费的。这儿一定至少有一个人我们不能欺骗的，这个人最好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完全的局外人，对我们的余生毫无影响的人，而不是那些我们要付昂贵费用 50 分钟 1 小时，一起待在治疗室的人。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知道，他们能理解我们的思路，看见到那些由于我们太过自我而看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意识和（或）无意识的欺骗可能变得自己也能显而易见；所以我们将有不受我们压抑的机理的怪念头影响的外部的存储器。

关于假定的主体是：主体必须知道他们不知道。这是分析的叙述还有机会起作用的唯一方式。分析家和被分析者的关系是不同意见中最基本的一个：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知道，他们必须知道他们不知道。这种分歧是所有分析背后的原动力。难题出现了：当分析家开始参与到被分析者的假定中就开始变得刚愎自负（如同基督教的七宗罪一样，这是心理分析中最致命的弱点之一），在分析中没有给一个“假定知道的主体”留有余地。事实上，心理分析的整个过程是被分析者逐渐觉醒的经历，他们逐渐认识到分析者其实并不知道。随着被分析者逐渐增长的洞察力，他们的自觉意识增加，分析家是无所不知的主体的假定开始褪色。这时，一个成功的分析被终止了，分析家已经被看低了，虽还不至于到被视为完全不学无术的地步，但至少被降到一个与被分析者平等的地位。很容易看出，一个成功治疗的主要威胁不在于被分析者拒绝假定分析家知道（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完全放弃分析而转向别处求助），而是从分析家的失败中认识到他们知识的缺乏。设想一个不存在的盈余总比实际的缺乏让人容易接受。大多数不成功的，过度拖延或最终流产的心理分析的治疗，它们的失败应该归咎于分析家无法接受他们并非无所不能这样的事实。

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类推，但我们知道齐泽克不会就此止步。他已经继续推演、延伸这个类推，并且得到一个表面上看似乎完全不相干的结论。对困惑的、分不清方向的激进左派来说，齐泽克也许就是一个暂时的“它”，但一个人就足够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寻找更多组织化、制度化的东西（哦，无意识的双关语！）？如果我们稍稍延伸一下拉康的假定知道的主体，我们将发现它也被应用于激进的政治主体，但是这次是随着复仇而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和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当他们开始和他们的追随者分享这个假定的时候，可以说，他们转变成了保守派，转变为激进的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在人们相信一个政党“知道”时候，他们追随这个政党，为它投票甚至真正地为它战斗。激发这种假定的方法是不同的，它可以是任何东西：从成功的宣传到“告诉真理”；从一般的煽动到群众心理的操纵；从小心翼翼的公众关系到科学幻想式的心智控制。这无关紧要。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于这些政党开始相信他们确实“知道”的时刻。当然避免这种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到“假定自己知道的主体”的转变的办法，不仅仅是有一个好的目的，或继续含混不清的誓言。任何激进的政治实体，都应该有内置的自我纯化的机制，它至少应该是少数派观点在这个政治实体内外幸存并宣讲的权利。

到这里，我们能开始一个基本的转向，自问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定义中，相对的，无产阶级在这里不适宜。做必要的更改，当然随着必要的调整，要把“共产主义”这个术语从七十年的布尔什维克时期粘贴上的消极内涵中拯救出来。为了挽救“无产阶级”这个术语，要以十九世纪为界，这样使重新定义它愈发困难。“无产阶级”这个术语后来的含混不清在于它变成了单指“工业无产阶级”和“肉体为生存条件的生产者”。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共产党人定义为先锋，甚至没把他们做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主体。他们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没有区分于这些政党的独立的原则。他们只是按照工人阶级运动的普遍思想行动（总是提醒各地各国的政党是跨国界的整体）。还有做为一个记忆存储器，总是回忆或提醒那些过去的奋斗、胜利和失败。共产主义者是跨国界的政治的主体，是做为工人阶级被看作一个整体的长期存储器，而不是其他。在齐泽克写的关于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文章中，他把建立跨国界的政治主体的任务描述为“当今唯一重大的问题”。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在对无产阶级的解说一致，并有重大的延伸。

所以教训是在世界新秩序和新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之间的选择，对立面即为错误的一方：这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世界新秩序自身养育了它一直对抗的怪物，这是为什么反对轰炸的抗议来自遍布欧洲的改革后的共产党，包括 PDC（社会民主党），都被误导了。这些反对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错误的抗议者就像讽刺画中的假冒的左派：他们反对对毒品商人进行审讯，声称他的犯罪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社会病理学的结果。与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奋战的道路不是通过支持本地的主要的法西斯主义者来反抗，而是应该集中到当今最重大的问题：怎样建立跨国界的政治运动和机构，而且要足够强大，能够有效地约束资本无限制的规则，还能促使明显的，和政治相关的事

实：使本地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也抵制世界新秩序，从米洛舍维奇到勒庞和欧洲的极端的右翼，都是其中一部分？（斯拉沃热·齐泽克 《反对双倍的勒索》）

齐泽克的跨国界的政治运动，被假定为是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双倍的勒索”的主要抵抗力。这是个不明确的主体，它提醒在塞尔维亚的运动中，米洛舍维奇实际上是他假装反对的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所在的地方，比方说，北约各国他们自己的国家正是像米洛舍维奇喜好的那样建造或者重建的。在齐泽克写下这篇文章多年以后，用完全相同的逻辑，现在我们可以名单上加上塔利班、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正如我们所见，在齐泽克的世界里它是完全可能的，从一个年轻人为躲避兵役的聪明的小把戏开始，到跨国界的革命的政治主体的构造结束。但是此外，我们不应该太投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开始假定我们已经解答了宇宙的神秘（或资本主义的、或革命的，或者即使一个单个灵魂的奥秘）。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刚开始看见把自己构造成激进主体的道路，远没有完全地明确。虽然现在关于斯拉沃热·齐泽克流行的表述已大大地倾向于他的自恋的一面，但他的自恋从来不是如此病态以致他能忘记对自己言论的一贯的质疑和对自己理论伦理框架的一贯问难。他是那些没有牺牲自己的激进主义，设法保留了混沌状态的人中的一个。

今天我们能对齐泽克希望的是，他不要找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因为只要他不停下来，我们也将继续寻找。